

丛书主编/何怀宏

1512.06x

581

人文译丛

陀思妥耶夫斯基
与女性问题

【美】尼娜·珀利堪·斯特劳

Nina Pelikan Straus

宋庆文 温哲仙/译

吉林人民出版社

Dostoevsky
and Woman
Question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陀思妥耶夫斯基与女性问题/(美)尼娜著;宋庆文,温哲仙译.—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1

(人文译丛)

书名原文 Dostoevsky and the Woman Question

ISBN 7-206-04129-9

I. 陀… II. ①尼…②宋…③温… III. 陀思妥耶夫斯基, F.M. (1821~1881)—思想评论 IV. I512.06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102545 号

吉林省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

图字 07-2002-1085

本书简体中文版出版权蒙 Nina Pelikan Straus 教授及圣·马丁出版社免费赠予,特此致谢。

陀思妥耶夫斯基与女性问题

著 者 尼 娜

译 者 宋庆文等

责任编辑 刘知会

封面设计 张亚力

责任校对 赵秋实

出 版 者 吉林人民出版社 0431—5649710

(长春市人民大街 124 号 邮编 130021)

制 版 吉林人民出版社激光照排中心 0431—5637018

印 刷 者 长春市华艺印刷厂

开 本 850×1168 1/32 印 张 8.375

版 次 2003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3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字 数 210 千字 印 数 1—6 000 册

标准书号 ISBN 7-206-04129-9/D·1034

定 价 14.60 元

如图书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承印工厂联系。

20 世纪西方视野中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形象

——“陀思妥耶夫斯基研究书系”序言

林精华

众所周知，巴赫金的国际性意义是经由欧美学界展开来的，虽然不能说陀思妥耶夫斯基在 20 世纪的世界性价值也是由西方发现并推演而来的，但可以肯定没有他们那富原创性的诠释，陀思妥耶夫斯基文化遗产至少不会成为 20 世纪知识分子应付社会变迁的重要思想资源之一。而且，诚如巴赫金的普遍性价值不是人为制造出来的那样，陀思妥耶夫斯基这种伟大性也不是西方学者人为假定出来的，而是对作家本体的知性描述和心性体验的结果。

早在 1928 年德国批评家 Julius Meier - Gradfe 在其长达 406 页著作《陀思妥耶夫斯基其人其作》(1928) 中就声称：“陀思妥耶夫斯基打开了一个新世界：他探究的诸多领域都是为前辈们所不知的……在不久的将来，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影响力就会像歌德或席勒那样，甚至已经是如同莎士比亚那样发生了作用，这不是夸张的假定。只有他这样一个俄国人才获得这种全欧洲性的影响，而在我们时代的精神价值中并不是任何一种时髦的大众化诉求都被容许存在

的”^①。稍后不久，弗洛伊德（S. Freud）在其杰作《陀思妥耶夫斯基与弑亲》中断言，在陀思妥耶夫斯基丰富的个性中有4个重要层面：创造性的艺术家（creative artist）、神经病患者（neurotic）、伦理学家（moralist）和无神论者（sinner），其中作为创造性的艺术家是最无可置疑的——其位置远不在莎士比亚之后，他的《卡拉玛佐夫兄弟》是一部前所未有的宏大小说，特别是那里面的“大法官”插段叙述是世界文学的顶峰之一^②。很快，英国重要文学家劳伦斯（D. H. Lawrence）在给《大法官》这个片段的英译本所写的序言中（1930）生动地描述了他阅读《卡拉玛佐夫兄弟》的激动情景：头两次阅读因为作品叙述得太真实而被击倒，第三次阅读该作依旧有那种从头凉到脚的灵魂震撼。当然，20世纪初的这种情形与19世纪后期西方一批重要文学家和学者普遍的积极阅读是不无关系的：英国著名小说家斯蒂文森（Robert Stevenson）1886年春天致友人书信中说“《罪与罚》是我最近十年来阅读到的最伟大作品”，美国小说家豪威尔斯（William Howells）1886年9月在著名的《哈帕斯新月刊》杂志（*Haper's New Monthly Magazine*）上著文《关于〈罪与罚〉的一种批评》声称此乃震撼人心之作，丹麦批评家勃兰兑斯在《俄国印象记》（1889）中给“陀思妥耶夫斯基”专列一节并断言《罪与罚》乃叙述时代的巨幅油画，而在英国重要文学史家 Waliszewski 著述的《俄国文学史》（1910）中陀思妥耶夫斯基获得了特别重要的位置。诸如此类，不一而足。

① Julius Meier - Graefe, Dostoevsky: *The Man and His Work* (trans. By Herbert H. Marks), Routledge and Sons, 1928, pp.1~2.

② Sigmund Freud, *Dostojevski und die Vaertotung*, in *Die Urgestalt der Burler Karamazoff*, Piper, 1928, 1959年被 D.F. Tait 翻译成英文由 The Hogarth press 作为基本书目推出。

创造性接受与俄国经验

事实上，西方在对陀思妥耶夫斯基问题上的认识，并不是来自个人经验式的印象批评，而是有很深厚的俄国经验的基础，或者说是在重视俄国阅读实践基础上理解这位作家的。

白银时代重要文学家和理论家梅列日科夫斯基 1902 年出版的杰作《托尔斯泰与陀思妥耶夫斯基》，当年就被译成英文并以《作为艺术家的托尔斯泰与陀思妥耶夫斯基》为题出版（1970 年著名的绿林出版社再版）；克鲁鲍特金 1901 年在罗维尔研究所（The Lowell Institute）发表的演讲《冈察洛夫、陀思妥耶夫斯基和涅克拉索夫》，也于 1906 年被收录在他《俄罗斯文学》一书的英文版中在西方发行；1957 年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推出了弗拉基米尔·谢杜罗（Vladimir Seduro）的译文集《俄国文学批评中的陀思妥耶夫斯基：1846~1956》，该译作收录了别林斯基论《穷人》（1846）和《女房东》（1847）、杜勃罗留波夫论《双重人格》（1861）、皮萨列夫论《罪与罚》（1867）、陀思妥耶夫斯基本人 1873 年日记、白银时代一批文学家论陀思妥耶夫斯基等经典篇目。不仅如此，苏联理论家康斯坦丁·穆楚尔斯基系统论述陀思妥耶夫斯基生活和创作道路的力作《陀思妥耶夫斯基：生平与创作》（1947）也由著名学者米切尔·米尼汉（Michael Minihan）翻译出版（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 1967 年）。而别尔嘉耶夫的《陀思妥耶夫斯基：一种诠释》，于 1957 年被译成英文出版（译者 Donald Attwater）。特别是，文学批评家韦勒克（Rene Wleek）曾编辑翻译过《陀思妥耶夫斯基：批评论文集》（Prentice - Hall, Inc, 1962），其中收录有德米特里·奇捷夫斯基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双重主题》（1929）、卢卡奇的《陀思妥耶夫斯基》（1943）之类重要篇章。此外，1961 年沃德沃斯出版公司推出英文版译文集《〈罪与罚〉及批评》（由 Edward Wasiolek 翻译），它

收录了苏联著名学者弗拉基米尔·叶尔米洛夫综述苏联关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研究的论文《苏联观点：1956年》等一系列重要论作。而白银时代著名文学家维亚契斯拉夫·伊凡诺夫的力作《自由与悲剧生命：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一种研究》，也于1952年由卡梅伦（Norman Cameron）翻译成英文出版（Nooday出版社）。

值得一提的是，这种重视俄国阅读经验的传统，没有因为冷战而终止，也没有因为苏联解体而急剧膨胀，而是一直有序的延续着。康奈尔大学出版社1972年出版了罗伯特·斯宾塞（Roberts Spencer）翻译的白银时代哲学家罗赞诺夫之著名论文《大法官传奇》（1906）英文本《陀思妥耶夫斯基与大法官传奇》，科特连斯基（C.C.Koteliansky）教授1974年翻译出版了《陀思妥耶夫斯基书信新编》（Haskell出版公司），在国际上享有盛誉的《陀思妥耶夫斯基：诺顿批评研究文献》（Norton & Company, 1975）则收录了斯特拉霍夫（作家的朋友和著名出版家）的《虚无主义者与拉斯柯尔尼科夫的新理念》（1867）、白银时代象征主义批评家楚尔科夫的《陀思妥耶夫斯基是如何创作的》（1939）、苏联杰出学者弗·艾夫林的《情节结构与拉斯柯尔尼科夫的犹豫》（1948）、列昂尼德·格罗斯曼以论陀思妥耶夫斯基为主的《小说结构》（1959）等俄国批评界的重要论文。特别是，巴赫金的《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也于1973年由罗茨尔（R.W.Rotsel）译成英文出版（Ann Arbor出版社），1980年代得到再版，这对提升陀思妥耶夫斯基阅读水平发生了革命性影响。此外，加州大学（伯克利校区）教授克娜普（Liza Knapp）主编和翻译了《作为改革家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彼得拉舍夫斯基案件》（Ardis出版社1987年英文版），杰弗森教授（N.C.Jefferson）编辑整理了长达370页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档案：选自当代论文集和优秀期刊的第一批书目汇编》（McFarland出版公司1997年英文版），该书在长达13页的导言中说明了这种工作的意义，最后还附有作家很详细的年表和注释性参考书目，很有学术价

值。

这种重视俄国资源的阅读传统，确定了西方在接受陀思妥耶夫斯基问题上的规范性，也为他们的创新准备了基础，或者说西方创造性阅读陀思妥耶夫斯基并非无中生有、异想天开。20世纪末俄国学术界大量翻译包括陀思妥耶夫斯基研究成果在内的西文学术著作，显示出西方学术成果的魅力，而这种魅力正是源自俄国基础文献与西方理论的结合。

接受的新阶段：走向综合性

20世纪前40年欧美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关注，以介绍作家传记、基本情况、综合性评述为主，参加讨论的人没有专业限制，讨论的阵地也不限于专业学术报刊。

英文畅销报纸《观众》(*The Spectator*)早在1912年就发表《陀思妥耶夫斯基》(9月28日)(该文围绕几部重要作品来介绍这位伟大作家基本情况)，重要学者斯塔拉切(Lytton Strachey)触及陀思妥耶夫斯基创作中幽默特点的重要论文《一位俄罗斯幽默作家》最早也是见于该报(1914年4月11日)。当然，西方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接受远不限于这份报纸，艾肯(Conrad Aiken)在其《费多尔·陀思妥耶夫斯基》(1921)中比较早地借用弗洛伊德理论分析作家心理和感情与文学创作之间关系、作家整个创作历程，这篇很有特色的传记最早刊于《自由民》(*Freeman*)季刊^①。西蒙斯(Ernest J. Simmons)的《陀思妥耶夫斯基：一位小说家的诞生》(1940)则由一家图书公司推出，这是一种注重叙述作家精神成长的传记，他仔细研究了陀思妥耶夫斯基成长为独特心理小说家的生活历程及显

^① 本文最早以《精神病式的交响曲》刊于《自由民》(*Freeman*)季刊总第94期(1921年第4期)，1968年再版于作者的《批评论文集》(牛津大学出版社)。

示在文学文本上的证据。而本奈特 (Arnold Bennett) 的《屠格涅夫和陀思妥耶夫斯基》刊在《新年》(New Age) (1910年3月31日)上, 该文很风趣而又有特色地比较了这两位作家之间的差别。拉波瑞恩 (Janko Labrin) 那部不大的著作《陀思妥耶夫斯基: 一种研究》(麦克米兰出版公司 1947年英文版), 却是比较早地讨论陀思妥耶夫斯基在欧洲小说史上贡献问题之作, 作者在此认为“他扩展了欧洲小说创作的范围或领域”。上文提及的德国学者 Julius Meier-Gradfe 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其人其作》则以印象主义方式叙述作家传记过程和评述其主要作品, 因其叙述和评述得比较全面、独特、深刻而享誉西方斯拉夫学界, 当年就被译成英文。至于英国传记作家和史学家卡尔 (Edward Hallett Carr) 所著述的《陀思妥耶夫斯基: 一种新传记》(1931) 透过作家精神危机的发展历程评述其整个创作。此外, 熟练运用各种文体写作的英国重要小说家巴林 (Maurice Baring) 非常热爱俄国文学, 在 1910 年出版的《俄国文学中的几处重大标志》中专列一章, 全面分析陀思妥耶夫斯基作为俄国文学史标志性作家的基本构成, 并在对《卡拉玛佐夫兄弟》之类重要文本的几位主人公形象分析过程中, 确信作家是维护基督教的现实主义者^①。而这种阅读, 正好吻合这位英国作家本人作为著名基督教辩护者 (apologist) 的身份。这些情形表明, 20 世纪上半叶西方塑造陀思妥耶夫斯基形象还不是很学术化的: 公共传媒能成为介绍这位复杂思想家和文学家的重要传播载体, 对作家讨论所使用的术语、概念、叙述方式等并不具有专业文学研究特点, 这种接受也大大丰富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形象。

不仅如此, 试图对作家进行本体论的评价, 或者说要在陀思妥耶夫斯基创作中找出明确主题、寻找作品思想、确定作品风格等, 也是这个时期研究的重要趋向。Middleton Murry 作为英国文学批评

① Maurice Baring: *Landmarks in Russian Literature*, London, 1910, pp. 80 ~ 162.

家尽管以关心现代批评理论著称，但是在其重要著作《陀思妥耶夫斯基：一种批评研究》（1916）中却批评英语读者不该无限地赞誉陀思妥耶夫斯基，并且反对把《卡拉玛佐夫兄弟》称之为“俄罗斯生活的百科全书”（an encyclopedia of Russian life）这种传统阅读，认为作者不可能做得到这样，声称持此论的人是把对文本的认识建立在虚设基础上的。在他看来，比起其他作家来，陀思妥耶夫斯基是深入人心的心理小说家，其同情怜悯之光耀眼地普照着黑暗和野蛮国度。在这种阅读视域下，他细致地探究了作为一种象征的《卡拉玛佐夫兄弟》中文学、审美与宗教三者间的关系：父亲费朵尔·卡拉玛佐夫是混乱无序的能量（chaotic potentiality）之象征，儿子德米特里·卡拉玛佐夫乃奢侈享受（voluptuousness）之象征，伊凡是知性（intellectuality）的象征，阿廖沙则为先验灵魂（transcendent spirituality）之象征，从而断言陀思妥耶夫斯基是追求宗教主题的作家^①。法国著名批评家和作家安德鲁·纪德（Andre Gide）在法文版著作《陀思妥耶夫斯基》（1923）中尝试不是根据德行或心灵的好坏把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主人公分为积极/消极或好/坏两部分，而是依据人物自尊的程度探讨作家笔下主人公有超越于性别意义的男女之分——所有男性没有一个是特别值得尊敬的，而所有重要女主人公都因其自尊而令人感动^②。英国批评家查尔斯·萧（Charles Gray Shaw）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神秘恐怖》一文中认为作家所有重要文本，诸如《白痴》、《罪与罚》和《卡拉玛佐夫兄弟》等要表达的主题是精神虚无主义、无政府主义和激进主义思想如何侵袭了俄国民众和知识分子^③。同样，瓦尔内（Rex Warner）的《陀思妥耶夫

① Middleton Murry: *Fyodor Dostoevsky: A Critical Study*, Martin Secker, 1916, pp.21 ~ 49, 203 ~ 259.

② *Andre Gide, Dostoevsky* (原文为法文 trans. By Arnold Bennett), New Directions, 1961.

③ *Quoted The North American Review*, No2, February, 1918, pp.246 ~ 256.

斯基与自由主义的挑战》(1947)通过对经典文本阅读而探寻陀思妥耶夫斯基对自由主义和个人主义主题的反应、对欧洲社会分化路径的独特理解。

由此可见,这时期西方所塑造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形象是一个“公众人物”,掌握一定知识量的读者正是通过这种阅读了解这位异域的伟大文学家。

西方接受的继续演化:文本细读式分析

1940年代之后欧美学术界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研究发生了重大变化:文本分析成为主流,对作家传记式批评日渐稀少。这种情形的出现,与先后兴起的新批评派、叙事学批评、语义学批评等渗透进斯拉夫学术界密切相关(当然还有客观原因:伴随着文化传媒的日渐发达,欧美社会对陀思妥耶夫斯基和俄国文学基本情况的了解也越来越深入,因而专业研究成为不可避免的趋势)。在这种背景下,陀思妥耶夫斯基重要文本都得到了多视角的充分诠释。

首先得到特别重视的是《罪与罚》。在上述所引进的俄国阅读陀思妥耶夫斯基文献中,关于《罪与罚》的研究占有相当比重。不仅如此,著名学者杰克逊(Robert Louis Jackson)主持翻译编辑了《20世纪关于〈罪与罚〉的诠释:批评论文集》(Prentice-Hall出版社1974年英文版)[收录有尼古拉·奇尔科夫1945—1949年著述的《一部伟大的哲学小说》、德国学者奥纳斯(Konrad Onasch)教授1961年发表的《玛尔梅拉多夫之死》等重要文献]等。大半个世纪以来欧美斯拉夫学界重要批评家都涉足过这个领域,而且对这个文本阅读的思路非常宽阔。毕比(Maurice Beebe)作为专门研究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权威,其著名论文《拉斯柯尔尼科夫的三个动机:对〈罪与罚〉的再阅读》(1955)认为这个人物身上存在着知性、情感和精神三方面冲突与人—神/神—人之间的矛盾,作家的本领

就在于用心理学的叙述策略揭示在这个主人公形象身上存在的这种复杂现象，因而单方面认识这个问题是会困难重重的^①（该文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研究中成功运用新批评方法的佳作）。美国学者盖卜（George Gibian）通过大量翻译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和研究著作而后发表论文《〈罪与罚〉中的传统象征主义》（1955），认为传统象征主义既是该文本结构中的重要因素，也是作家表达思想的重要途径。在他看来，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水、太阳、空气、植物、大地等不同程度的存有与拉撒路和基督复活相关的强烈意象特征。美国左翼批评家雷弗（Philp Rahv）在著名的《游击队评论》（*Partisan Review*）杂志上著文《〈罪与罚〉中的陀思妥耶夫斯基》（1960），采用历史学和社会学批评方法，讨论这个文本叙述结构的复杂性与作家对社会、文化、知识分子等问题认识的不确定性之关系，并肯定地指出陀思妥耶夫斯基是第一位创造出性格多变的主人公形象的伟大小说家，而且其伟大性源自小说叙述的张力。莫蒂默（Ruth Mortimer）采用心理学批评方法著述《陀思妥耶夫斯基与梦幻》（1956），包括《罪与罚》中四个梦所蕴含的各种心理学意义得到了叙事学方法的细致描述。而法国学者弗兰克（Joseph Frank）的著作《拉斯科尔尼科夫的世界》（1966）以一个人物形象作为个案，分析1860年代俄国激进主义思潮对文学叙述的影响。这些关于《罪与罚》批评的论作，是用科学方法研究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重要文献，特别体现欧美在解读陀思妥耶夫斯基经典文本上那种严谨精神和细读方法。

同时，《卡拉玛佐夫兄弟》也得到充分重视，并因为这个文本自身的复杂性，欧美学术界对其探讨的视角和方法更趋于多元化。作为德裔美国翻译家、出版家和批评家拉尔夫（Ralph Matlaw），他独到地探查《卡拉玛佐夫兄弟》叙述中的神话和符号的用途：对文

① *Quoted Collge English*, Vol.17, 12/1955, pp.151~158, Ralph Matlaw.

本叙述中所涉及到的许多概念（诸如“美”、“善”、“人性”、“神性”等）、姓名、火的各种形象，甚至包括各种人物衣着或自然风光或城市建筑中红、黑和白各色等，他运用语义学原理并结合俄国文化传统予以深刻分析，从而解析出为什么后来的象征主义常常要接受陀思妥耶夫斯基影响这一重要文学史传承现象^①。乔伊斯·卡罗尔·欧茨（Joyce Carol Oates）作为美国重要小说家和批评家，其《〈卡拉玛佐夫兄弟〉中悲剧与喜剧的景象》（载《容忍的极限：文学的悲剧形式》1972年英文版），感兴趣于文本叙述中的戏剧性诗学风格，并探讨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诗学的独特贡献——叙述的客观性和小说文体的进步。作为英国诗人和史学批评家的卡尔德（Angus Calder），其《反抗与黄金时代：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晚期小说》（载《被发觉了的俄罗斯：从普希金到契诃夫的19世纪小说》1976年英文版）特别关心卡拉玛佐夫兄弟中的道德、审美和社会心理各个层面问题，并用语义学方法呈现出这些问题的语言学表述特征。在俄裔美国文学家纳博科夫的杰作《俄国文学讲稿》中，陀思妥耶夫斯基占有特别重要地位，论及《卡拉玛佐夫兄弟》则重于描述该文本如何天衣无缝地设置一个不成功的侦探故事，因为作者本身是高超作家，因而他的论述妙趣横生、又很符合叙事学规则。而出生于爱沙尼亚的美国重要学者和翻译家特瑞斯（Victor Terras），其力作《卡拉玛佐夫的同伴：论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的起源、语言和风格》（1981）依据俄国理论家列昂尼德·格罗斯曼之作《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创作道路》中“道德剧”之论，研讨《卡拉玛佐夫兄弟》中的叙事声音和情节设置的复杂性问题，在这一诗学透视下该作成为一部戏剧性小说（dramatic novel），叙事者、伊凡、德米特里、作为对佐思马长老声音回应的阿廖沙、费多尔·帕甫洛维奇等人物的声音由此获得了超越小说文体的价值，从而发现这个复杂文

^① Ralph Matlaw, *The Brothers Karamazov: Novelistic Technique*, Mutton & Corn., 1957.

本的结构意义取决于对各种人物内心焦虑 (suspense) 的不同叙述^①。瑞典著名宗教学问题专家汉斯·昆 (Hans Küng) 在其另一部重要著作《在超越宗教边界争论中的宗教》(1985) 中, 把《卡拉玛佐夫兄弟》视为现代世界中基督教启示录或预言性的叙事作品^②。而维沃斯 (Eliseo Vivas) 的《〈卡拉玛佐夫兄弟〉中真实性的两个纬度》关心小说叙述中所表现出来的“俄罗斯”与“欧洲”概念问题, 亚瑟 (Arthur Traced) 的《疑惑之炉: 陀思妥耶夫斯基与卡拉玛佐夫兄弟》(1988) 讨论作家如何叙述传记性语境和信仰问题, 艾门德 (Victor Amend) 专注于《卡拉玛佐夫兄弟》的音乐结构主题问题 (载《现代小说研究》杂志 1958 年秋季号), 雷弗 (Philip Rahv) 专门讨论《卡拉玛佐夫兄弟》中《大法官》的精神震撼力问题而著文《大法官传奇》。诸如此类的文本分析, 普遍体现出运用叙事学阅读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的方法论意义。

仅次于《罪与罚》和《卡拉玛佐夫兄弟》特别受到西方学术界推崇的作品是《地下室手记》。门罗 (Monroe C. Beardsley) 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地下室手记〉中的隐喻》(《观念史杂志》1942 年第 3 期) 出手不凡, 一开始就讨论文本中相当复杂的隐喻意象和结构问题。接着, 上文提及过的德裔美国批评家拉尔夫 (Ralph Matlaw) 的重要论文《〈地下室手记〉的结构和综合问题》(PMLA 杂志 1958 年第 1 期) 着重研究该文本中的叙事过程与象征主义关系, 上文提及的美国教育家和批评家杰克逊则在著作《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俄国文学地下室里的人》(1958) 中讨论俄国理性主义“反英雄”的预言式人物性格问题, 法裔美国批评家和诗人斯蒂内

① Victor Terras: *A Karamazov Companion: Commentary on the Genesis, Language, and Style of Dostoevsky's Novel*, the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1981.

② Walter Jens & Hans Küng: *Literature & Religion: Pascal, Gryphius, Lessing, Holderlin, Novalis, Kierkegaard, Dostoevsky, Kafka*, (translated by Peter Heinegg), Farragon House, 1991, pp. 223 ~ 242.

(George Stiner) 的《托尔斯泰或陀思妥耶夫斯基：旧批评论文集》(1959) 重点之一是讨论《地下室手记》中生理学和心理学内容，上文提及的法国弗兰克则在其长文《虚无主义和〈地下室手记〉》(载《赛旺评论》1961年第1期) 从教育学角度讨论青年人反社会的思想或行为与尼采思想、车尔尼雪夫斯基民粹主义和西方功利主义教育制度之影响等问题(这种论述，在他主持的5卷本陀思妥耶夫斯基传记第3卷《陀思妥耶夫斯基：解放的激动，1865年》中得到了进一步发展：认为该作是对1840年代社会浪漫主义和1860年代俄国虚无主义的滑稽模仿。这卷于1986年问世)，著名学者辛格尔(Ronald Hingley) 那部《未被发现的陀思妥耶夫斯基》(1962) 对作为道德意识问题的思想家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论述，很多情况是依靠《地下室手记》来支持的。

当然，其他文本，甚至包括作家日记，在这时期也得到不同程度的重视。

这时期还出现了综合论述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趋势。美国俄罗斯文学翻译家和批评家的瓦西列科(Edward Wasiolek) 在翻译作家日记之后著述了《陀思妥耶夫斯基：主要小说研究》(1964)，很成功地把传记批评与文本分析结合，通过分析作家创作生平与情感变化因素来讨论《穷人》、《双重人格》、《地下室手记》、《白痴》、《罪与罚》等文本中人物价值归属问题，这种研究发现《卡拉佐夫兄弟》中卡拉玛佐夫兄弟家族的信仰危机、子辈反对父辈等问题，与人反对上帝之间的一般性问题之间存有平行结构的意义，这就找到了德米特里与卡杰琳娜、伊凡、斯梅尔佳科夫、人面兽心的文人等象征意义。美国斯拉夫学界著名教授罗伯特·杰克逊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艺术：精神错乱与夜曲》(1981) 用分析哲学方法考量许多重要文本中主人公的“意识辩证法”——人性中的同情情感与厌恶情绪、自足的方面与缺欠的方面之间冲突。

也正是在这种综合性研究趋势中，出现了马克思主义批评。意

大利批评家和新现实主义文学代表的阿尔贝托·莫拉维亚（Albeerto Moravia, 1907—1990）在《马克思—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决斗与俄罗斯其他笔记》（1956）中论述了《罪与罚》所折射出的马克思主义思想、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小说的文学叙述之间的矛盾等问题，认为主人公因愤怒于沙皇俄国缺乏公正而成为马克思主义人民代表的原型（prototype），特别是作者对这类叙述予以积极的辩护。这是关于《罪与罚》研究中很奇特的一种马克思主义批评论。布莱克姆尔（Blackmur R.P.）这位 60 年代美国文学批评界的领袖，以研究商业社会中艺术家与读者之间的媒介关系问题而著称，带着这种视野透视陀思妥耶夫斯基时，他发现《卡拉玛佐夫兄弟》等文本中的社会性叙述主题及在各主人公形象身上所体现出来的正义和罪行之主题，是通过资本主义经济活动整合在一起的，这种社会学批评与同时期的苏联似乎遥相呼应（参见他《论欧洲小说 11 篇》，1964 年英文版），只不过他对作家是作了肯定性的论述而苏联则是否定性的评价。《巴赫金传》作者之一的霍奎斯特（Michael Holquist）在其《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小说》（1977）中，从俄国文化的存在方式和知识分子对其表述方式的复杂性方面，探寻叙述体文本在俄国变迁的历史，找到陀思妥耶夫斯基推进小说发展的文化根基——小说不纯粹是审美的，而是与知识分子表达对社会各种责任和宗教诉求联系在一起。在这个基础上，他根据《白夜》、《冬天的夏天印象记》和《地下室手记》等文本具体分析作家是如何叙述故事的，依据《罪与罚》探讨叙事者重要功能问题，从《白痴》和《群魔》中分析出如何叙述圣徒传记和异教徒的群体传记，立论的独特性和表述的逻辑性令人叹为观止。当然，其间也有运用弗洛伊德俄狄浦斯情结和卢卡契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分析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创作于欧洲小说史演化的贡献，因而在他那儿，主人公拉斯科尔尼科夫的罪与罚问题、卡拉玛佐夫家族中父辈与子辈矛盾症结和变化问题（其中《儿子何以变成了父亲：卡拉玛佐夫兄弟》）充满着西方马克

思主义话语理论的深刻性。

当代阅读：学理性研究与“问题”意识

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研究方面，欧美学术界一直有“问题研究”传统。德国学者茨韦格（Stefan Zweig）比较早地触及到陀思妥耶夫斯基创作中的存在主义问题，认为“我是谁？”（“Who am I”）、“我生存何处？”（“Where exist I”）和“我的价值是什么？”（“What is my worth”）等是他所有重要主人公性格问题所在，从而也引发出作家那独特的创作特点——叙述的是思想而不是事件、是讨论哲学问题而不是描述情节^①；波戈里（Renato Poggioli）在1952年推出的《陀思妥耶夫斯基，或者事实与神话》，就依据《死屋手记》和《卡拉玛佐夫兄弟》讨论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独特现实主义：自然主义和神秘主义在这位作家身上是相互转换的（interchangeable）、在方法论上“现实与象征、自然主义与神秘主义如何相互并存的（ambivalence）”等问题，比起其神秘洞察力诸多因素来，他从来不是一个现实主义者，而是通过作为“第二视角（second sight）”的欧基里德思想来叙述复杂神话和哲学思想的人，因而在其创作中精神是不朽的、超自然的、形而上的^②。这种问题研究传统进入1980年代以后得到了强化，也促使了西方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研究发生了重大变化，即“问题”意识普遍得到重视，并构成当代陀思妥耶夫斯基研究重要潮流。

首先，陀思妥耶夫斯基与俄国文化自身关系首先得到强烈关

① Stefan Zweig, *Drei Meister: Balzac, Dickens, Dostoevsky*, Viking Penguin Inc., 1930, pp. 99 ~ 238.

② Renato Poggioli, *Dostoevsky, or Reality and Myth*, in *The Kenyon Review*, Vol. xiv, No. 1, 1952.

注。其中，很有代表性著作是耶鲁大学教授玛琳娜·科斯塔列夫斯基 (Marina Kostalevsky) 之《陀思妥耶夫斯基与索洛维约夫：完整视域中的艺术》(1997)，它以感性化的语言叙述俄国这两位大师在现实生活中的相互关系、在创作上的彼此互动关系，从而使对陀思妥耶夫斯基哲学和文学的研究具有深厚的文化基础，并使我们明白俄国文学何以具有超越审美的强大功能，以及俄国哲学何以建立在与文学互动关系基础上；加州大学（伯克利校区）克纳普 (Liza Knapp) 教授著述的《根除惯性：陀思妥耶夫斯基与形而上学》(1996)，运用自然科学理论（惯性学说）讨论陀思妥耶夫斯基哲学中所蕴含的当代科学意识及其对文学叙述的深刻影响问题；而穆拉夫 (Harriet Murav) 著述的《神圣的傻瓜：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与文化批评的诸种诗学》(1992)，从东正教历史传统中探寻“因为热爱基督的傻瓜”——“神圣傻瓜”及其在语言表述上的反映、陀思妥耶夫斯基对这个概念的独特理解，在这一基础上分析作为圣徒行传 (hagiographic text) 的《卡拉玛佐夫兄弟》中的圣愚形象、研究《作家日记》中反常的傻瓜形象的心理学区根据、探讨《罪与罚》对主人公心理考验事件的叙述等，而且《白痴》中认识论的宗教学意义、《群魔》的神圣性与世俗性或亵渎神灵之矛盾等也得到重视^①。伊琳娜·帕佩尔诺 (Irina Paperno) 教授的力作《陀思妥耶夫斯基论作为文化机制的俄国自杀问题》(1997) 探讨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创作中很多人物生命终结和精神死亡现象的叙述问题，并找寻出俄国文化制度关于自杀的形而上或世俗性理解对陀思妥耶夫斯基在这个论题叙述上的积极影响等。这类著作从俄国文化传统角度探究陀思妥耶夫斯基，体现了当代西方关于俄国文学研究的实绩。

接着巴赫金的话题或思路往下说，也是不能不注意的一种重要

^① Harriet Murav, *Holy foolishness : Dostoevsky's novels & the poetics of cultural critique*,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2.